



日本东亚  
政策研究



百年南开  
日本研究文库

# 日本东亚 政策研究

米庆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米庆余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7(2020. 4 重印)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ISBN 978-7-214-23283-0

I. ①日… II. ①米… III. ①日本—对外政策—研究—东亚—近代 IV. ①D8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3179 号

书 名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著 者 米庆余

特 约 编 辑 康海源

责 任 编 辑 史雪莲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责 任 监 制 陈晓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7.75 插页 4

字 数 49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3283-0

定 价 132.00 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刘岳兵

副主编：杨栋梁 李 卓 宋志勇

委 员：俞辛焯 米庆余 王振锁

杨栋梁 李 卓 赵德宇

莽景石 宋志勇 刘岳兵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2019年南开大学建校百年校庆，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如何使纪念百年南开的活动具有历史意义？我们很早就开始谋划和筹备。早在2015年春节期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原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向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提起，想以集体展示日本研究院研究成果的形式来纪念南开百年校庆。这一提议得到了保顶同志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研究院各位同事的积极响应。后来经过商讨，编委会一致同意以“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作为南开日本研究者纪念百年校庆丛书的名称，本文库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与百年校庆相适应，“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也应该是百年来南开日本研究业绩的展现。为此，编委会确定本文库由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构成。

第一，从南开大学创立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期南开的日本研究成果。刘岳兵教授搜集相关文稿四十余万字，编成了《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这是一本专题性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集，对于研究和总结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这一时段中国日本研究的状况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

第二,新中国建立以来,南开大学成立的实体日本研究机构研究者的成果。实体研究机构包括1964年成立的日本史研究室、2000年实体化的日本研究中心和2003年成立的日本研究院。

第三,1988年组建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以日本史研究室成员为核心,联合校内其他系所相关日本研究者成立的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构。在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日本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库也包括该中心成员的成果。

今后,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以将日本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和毕业生的优秀成果也纳入这个文库中,希望将本文库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充分且全面反映南开日本研究水平的成果展示平台。

在中国百年来的日本研究中,南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史的发展和南开的先贤告示我们:日本研究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日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百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孜孜以求,探寻日本及中日关系的真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是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两校日本研究者倾注近20年心血合力打造出来的。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及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也几乎是倾日本研究院全院之力而得到了学界认可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另外,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从1995年开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展现了中心成员在日本研究各具体专题上的业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成果都是南开日本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体展示。我们相信,本文库将成为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和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双一流”建设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她将承载南开精神、贯穿南开日本研究学脉,承前启后,为客观地了解日本、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也想以此为实现“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培养全民族的国际视野和情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历史知识和认识水平,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9年3月19日

## 前 言

（一）本书是多年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文选。内容分九个专题(编)，旨在“聚焦”日本国家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以期把复杂的历史事件尽力说个明白。

（二）本书论证与评说的主要依据，是再现和解读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因为对外政策才是日本国家对外行为的“推手”。让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出来作证，更能识别历史的真相。

（三）历史研究是份“苦差事”。求实求是、“扬清激浊”是研究者的本分，唯有锲而不舍、具有是非之心，才有希望走进历史的长河，发现事物的本质。

作者自序

二〇一八年元月

# 目 录

## 第一编 中日琉三国关系考 1

一 琉球的来历及《隋书》的原始记载 1

二 古代的日琉关系 7

三 明代中琉间的册封关系 13

四 近世的日琉关系 28

五 中琉关系的延续与发展 59

六 近代日本的占有琉球准备 69

七 日本政府强行“废琉置县” 81

八 中日有关琉球归属问题交涉 101

## 第二编 日本的“大陆政策”与“甲午战争” 139

一 日本明治初年的对外方针 139

二 日本对华首次立约与出兵台湾 144

三 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152

附件: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订的《征讨清国策案》 163

- 四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和战争的基本原因 179
- 五 “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 199
- 六 日本帝国在侵略中膨胀 215
- 第三编 日英同盟与对俄战争 224
  - 一 日俄关系的历史追述 224
  - 二 日俄在东北亚的矛盾 227
  - 三 日英同盟与对俄战争 237
  - 四 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 255
  - 五 日本对俄战争后的“攻势国防” 265
- 第四编 从“征韩论”的泛起到日韩“合并” 275
  - 一 日本明治初期的“征韩论” 275
  - 二 “江华岛事件”与迫订条约 281
  - 三 设立“特别居留地”与使馆驻兵 283
  - 四 “保护”韩国的决策与实施 288
  - 五 日韩“合并”与开始殖民统治 297
- 第五编 日本的“满蒙政策”与“九一八事变” 301
  - 一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301
  - 二 “满蒙政策”的用心和目的 311
  - 三 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 319
  - 四 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 329
- 第六编 统治大东亚的妄想与失败 341
  - 一 《国策基准》与全面侵华战争 341
  - 二 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真相 353
  - 三 “大日本帝国”投降 364

|                           |     |
|---------------------------|-----|
| 第七编 战后日本的对外关系             | 378 |
| 一 战后初期日本国家的战略选择           | 378 |
| 二 中日复交与“台湾问题”             | 411 |
| 三 冷战后日本国家的走向              | 452 |
| 四 面向 21 世纪的日美同盟           | 474 |
| 附件:战后日本与东亚关系点评            | 499 |
| 第八编 日本的神国观念与东亚            | 523 |
| 一 日本的神国观念与大国意识            | 523 |
| 二 神国观念与华夷秩序的碰撞            | 530 |
| 三 丰臣秀吉的“大日本”构想            | 543 |
| 四 德川时代“统治宇内”的思想           | 552 |
| 第九编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记载 | 562 |
| 一 钓鱼岛——《隋书·流求传》记载的高华屿     | 562 |
| 二 陈侃《使琉球录》记载的中琉疆界         | 564 |
| 三 日本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中绘制的钓鱼岛    | 577 |
| 四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的论证纲要   | 582 |
| 后 语                       | 586 |

# 第一编 中日琉三国关系考

## 一 琉球的来历及《隋书》的原始记载

### 1 琉球国号的来历

“琉球国，在泉州之东，自福州视之，则在东北。是以，去必孟夏，而来必季秋，乘风便也。国无典籍，其沿革不能详然。隋兵劫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从。我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遣使，首效归附，其忠顺之心，无以异于越裳氏矣。”<sup>①</sup>这是明代册封使陈侃在《使琉球录》(1534年)中，对古代中琉关系的记述，可谓相互地理位置清楚，往来关系明确。然而，上古时代的琉球，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一片茫然的神秘所在。

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sup>②</sup>这三座“神山”是否包括琉球，现今似已无从考证。但从此始有徐

<sup>①</sup> 陈侃：《使琉球录》(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3—54页。

<sup>②</sup>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书局刊本，第247页。

市(福)东渡日本之说,而琉球《万国津梁钟》的铭文则称:“琉球国者,南海胜地”,是为大明、日域中间之“蓬莱岛也”。<sup>①</sup>

琉球国史《中山世鉴》(1650年成书)记称:“盖我朝开辟,天神阿摩美久筑之。”“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sup>②</sup>也就是说,中国隋朝时代(581—617年)始有“流虬”之称。查中国典籍,“虬”者,龙之一种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云:“有角曰龙,无角曰虬”。以琉球群岛散在海上的地势而言,谓之“流虬”,实乃形之所似。但古代中国将“龙”作为华夏帝王的象征,而历代王朝作史,又多有忌讳。这可能正是《隋书·流求传》将“流虬”记称“流求”的缘故。此后,“北史、唐书、宋元诸史因之”,唯是汉字有别,或记作“琉求”(《宋史》),或记称“瑠求”(《元史》),也有记称“流鬼”者(《新唐书》)。日本僧人著述的《性灵集》则将之记称“留求”,《智证大师传》又记称“流楛”,<sup>③</sup>但发音未变。时至明代洪武五年(1372年),始称“琉球”。清代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记称:琉球国土人“自呼其地曰屋其惹,盖其旧土名也”。<sup>④</sup>但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补正曰:“屋其惹”乃是土音,“令之作书,则仍是琉球”。<sup>⑤</sup>由此可见,琉球国之来历,乃是系于地势“若虬浮水中”。

日本学界,有谓明代以前的琉球之称,并不固定者。若就汉字而言,确实如此。但谓之并无意义,则属不确。

① 该钟于琉球尚泰久王五年(1458年)铸成。铭文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吉川弘文馆1977年版,第87页。

② 《中山世鉴》首卷,见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五,名取书店1941年版,第8页。

③ 见宫城荣昌:《琉球の历史》,第18页。

④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六,见《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十五集,汲古书院1977年版,第170页。

⑤ 周煌:《琉球国志略》卷四。

## 2 《隋书·流求传》的原始记载

从现今保存的历史文献来看,有关古代琉球的记事,最早见于中国唐代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成书的《隋书·流求传》中。<sup>①</sup>内载:

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海师何蛮等人便对炀帝言称:每到春秋两季,“天清风静”之时,则可“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但“亦不知几千里”。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遂与何蛮俱往琉球,因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翌年,炀帝又令朱宽前往“慰抚”,但“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是时,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其所谓的“邪久国”,也即现今日本九州南部的屋久岛。也有主张包括琉球群岛者。从结果而言,朱宽等人似未达到使之顺从的目的。因而,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复遣武贲郎将陈陵、朝请大夫张镇州(亦记作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据《隋书·陈陵传》记载,陈陵等人率卒万余人,“月余而至”琉球。当初,琉人“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后来,陈陵“率众登岸”,始有“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于是,陈陵派遣张镇州为先锋,领兵迎战“小王欢斯老模”,并斩其首级。以致“渴刺兜率众数千”,复来“逆战”。双方激战,“陵乘胜逐北”,“渴刺兜背栅而阵”,“从辰至未,苦斗不息”。但因琉人势寡,终被陈陵率众破阵,遂“斩渴刺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人而归”。<sup>②</sup>

就上述记载而言,从陈陵率兵至琉,琉人“往往诣军中贸易”,后至双方厮杀格斗,“虏男女数千人而归”,所用的时间,至少当在数日以上。加之此前朱宽等人,两次前往琉球,并“掠一人而返”等等,从而使当时的中国人,能够实地观察和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乃至社会经济、政治,并在《隋书·流求传》中,留下多方面的记载。

<sup>①</sup>《隋书》卷八十一,中华书局刊本,第1823—1825页。以下引文不另作注。

<sup>②</sup>《隋书》列传二十九,陈陵传。

《隋书·流求传》对古代琉球的记载,多达 1300 余字,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乃至风俗、人情等等。为了便于陈述,现将有关记事大体分类如次:

其一,对古代琉球地理方位的记载。内称:“琉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这实际是对琉球的地理方位及其与大陆的距离,作了准确的记载。其中所说的“建安郡”,是为中国隋唐时期的地方建制,治所设在建瓯,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现今的福建省。由是观之,这种记载与前述陈侃所说的“流求国,在泉州之东,自福州视之,则在东北”完全一致。至其所谓“水行五日而至”,根据后世出使琉球者的记载,以及琉球官方学者的记述,在无风向逆转等情况下,也完全与实际吻合。如琉球紫巾大夫、地理学者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称:“福州五虎门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船。”<sup>①</sup>这“四十更船”,也即四天的时间,因为古人航海以十更为一日。若再加上从姑米山(即现今的久米岛)至琉球本岛那霸港的时间,仍需一日,则前后恰好是五天的时间。这说明隋唐时期的中国,对于琉球群岛及中国沿海岛屿的地理位置,业已非常了解。

这里,应该就便谈到的是,《隋书·流求传》中记载:大业六年,陈陵等人率兵远征琉球之时,自义安出海,先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鼃鼃屿,又一日便至流求”。从水路日程和地理状况来考察,其中所说的“鼃鼃屿”,当是现今冲绳的久米岛(姑米山)。<sup>②</sup>而其中所说的“高华屿”,按水路日程而言,当是中国的钓鱼岛或其附近岛屿。

其二,对琉球“王”者的记载。《隋书·流求传》称:“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继而又称,其国中“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这种情况说明,

<sup>①</sup> 《中山传信录》卷一,见《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十五集,汲古书院 1977 年版,第 37 页。

<sup>②</sup> 请参阅拙文“《隋书·流求传》辨析”(《历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日本学者比嘉春潮氏也认为《隋书·流求传》中所记载的鼃鼃屿,是现今冲绳县东部的久米岛(即历史记载的古米山),并认为高华屿是为中国的彭佳屿。见《新稿·冲绳的历史》,第 46 页。

公元七世纪前后的琉球社会,业已出现或形成了某种等级分化。其中所说的“王姓欢斯”,是为后世多有记载的“按司”(发音为阿基)。据称,“按司”是由“父亲”的发音演变而来的,且与“长者”属于同一语源。<sup>①</sup>而“渴刺兜”与“可老羊”,则可能是古代琉球语中“首领”(发音卡拉)的语音汉字。至于“村有乌了帅”的记载,据日本学者考察,似为“乌了帅”之误。而“乌了帅”乃是琉球古语“浦袭”(发音为乌拉欧索依)——村长的语音汉字。<sup>②</sup>由此可见,当时的琉球尚处于“村落”或称之为“部落”的时代,因而“小王”分立,“各理一村之事”。但从中也形成了得以统率“诸洞”“小王”的“按司”,也即“按司”中的“按司”(后世记称为“世主”)。因此,《隋书·流求传》记称其“国有四五帅,统诸洞”,并称“犯罪皆断于乌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等等。至于所谓“洞有小王”云云,据日本学者研究,乃是由于古代琉球人相信“太阳从东洞穴出,而落入西洞穴”,所以被视为如同太阳一般的“按司”,多住于山洞之中。<sup>③</sup>

其三,对琉球社会生产的记载。《隋书·流求传》称,“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禾黍、麻、豆……”。这种记载,说明当时的琉球,在农耕种植上已有很大的进步。但因“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所以在农耕生产上,又不免停滞在“刀耕火耨”的落后阶段。但是,从《隋书·流求传》的记载中,又可以得悉:当时的琉球人业已掌握了以木槽“曝海水为盐”,以“木汁为酢,酿米面为酒”的生产技术,而且掌握了“织斗篋皮并杂色苧及杂毛以为衣”,以及“织藤为笠”等生产技术。

其四,对琉球风俗、人情的记载。《隋书·流求传》称,其“男女皆以白苧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

① 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15—16页。

② 参阅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第49—50页。宫城荣昌《琉球历史》一书中,将“村长”注音为“母拉欧撒”,更与“乌了帅”发音相近。

③ 见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16页。

毛……。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珮”。继而又称：“男子拔去髭鬃，身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产后以火自灸，令汗出”，以及“食皆用手，偶得异味，先进尊者”。对于死者，则是“浴其尸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衬土而殓”，但“南境风俗少异，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等等。这些记载反映了古代琉球社会的风俗、人情，也再次说明了当时琉球社会发展的缓慢。也即，公元七世纪前后的琉球社会，尽管业已出现了等级分化，但依然保持着人类原始社会的种种风俗和习惯。

其五，对琉球社会及政治状况的记述。内称，当时的琉球“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时科决。犯罪皆断于乌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狱无枷锁，唯用绳缚。决死刑以铁锥，大如筋〔箸〕，长尺余，钻顶而杀之。轻罪用杖”。“无君臣上下之节”，也无“拜伏之礼”。但“王乘木兽，令左右舆之而行”。继而又称，其“国人好相争斗”，“两阵相当”，必有“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躁，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等等。

如此种种，说明当时的琉球业已形成了某种社会制约，但还相当落后。至于聚食死者，乃至将髑髅送至王所等等，中国元代汪大渊在其著述的《岛夷志略》中，也有台湾土著居民在“他国之人倘有所犯”之时，“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并“取其头（颅）悬（于）木竿”的记载。<sup>①</sup>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这种风俗可能是出于人类的自我保护意识，但也是社会生产落后的表现。此外，《隋书·流求传》记载，当时的琉球“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髑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由是观之，古代琉球人聚食死者，或将所杀之人祭其神等，又与当时的原始信仰有关。

总之，《隋书·流求传》为后世考察古代琉球社会，留下了最早的，也

<sup>①</sup> 见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注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7 页。